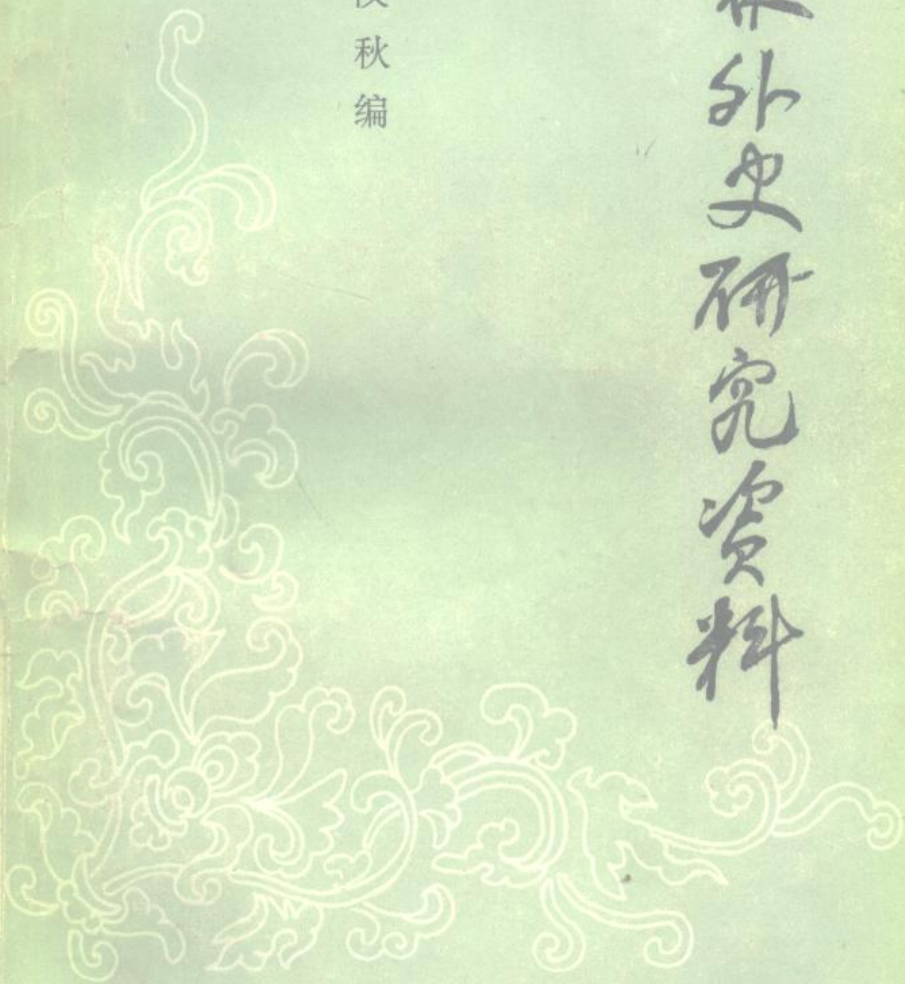


儒林外史研究資料

李漢秋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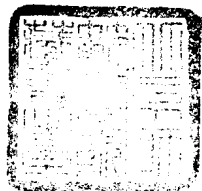
儒林外史研究资料

李汉秋编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994156



上海古籍出版社

994156

儒林外史研究资料

李汉秋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六合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12 插页4 字数252,000

1984年7月第1版 1984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0,500

统一书号: 10186·448 定价: 1.35元

文杏花葉香古栢虬龍附俯仰難自如移亭應就樹

東溪白雲亭

東溪有朝陽蒼蔚眾皦堆東溪人已去白雲自往來

芙蓉泚

朝採芙蓉花暮採芙蓉葉芙蓉不見人臨風舒笑靨

耕州閣

北舍飛倉庚南村鳴布穀細雨試開軒綠簷覆黃犢

因是菴

菴有綠牡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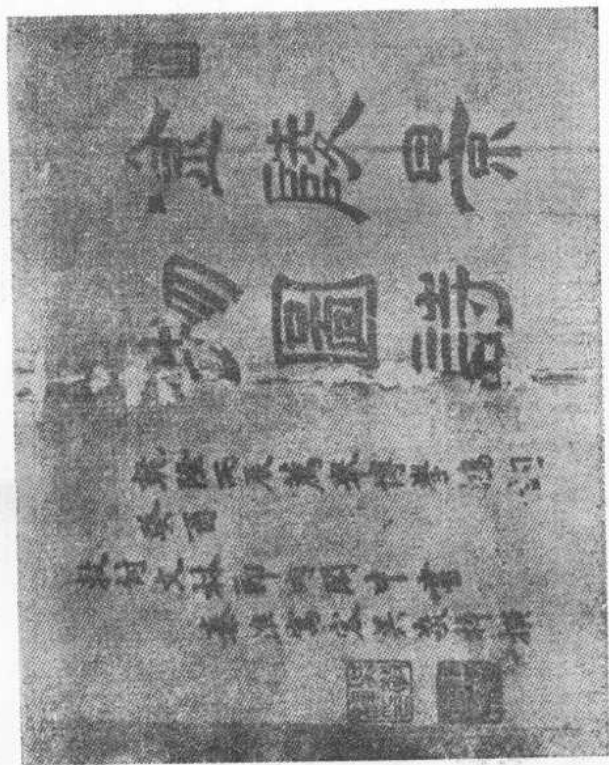
架上白鸚鵡廳前綠牡丹何如航海客親至落伽還

宋響齋

玉門關外狼煙夏
帳寧盧將有五鳴鶴
孝中款斷魂健兒何
豪吹羌管促君布
介出雲中萬里龍帽
廣漢原支陽寒映朝
駝紫霜花曉散局把
紅顏陸丹青工落續
不查漢煙盡邊塞化
日仍混塞外障園中
宜帶風沙懸探圖
指點功亦及轉使
精神同煮越香陸
豪畔控殘碑明起
冢上看明月
天恩三載拜君還
江南三度鴉花廳
警花穀芳州歡載
第廿崇勳芳茂
奉題
雅雨文子祖出塞圖

庚子吳敬梓

二、吳敬梓手迹——《奉題雅雨大公祖出塞圖》



三、吳敬梓《金陵景物圖詩》首頁

會心草堂集

無錫 吳培源 蒙泉

詩四

辛酉正月上弦與敏軒聯句

蟾魄出林薄。

吳培源

板橋烟靄生。水紋冰已泮。

吳敬梓 雲

葉雨初晴。鍾阜含輕碧。

培源

江湖蕩遠清。鳳樓簾影動。

敬

梓

鹿苑塔光明。香冷尋梅塢。

培源

宵長擁竹罌。靈辰宜刻

燕。敬梓

逸興且騎鯨。節近燒燈市。

培源

人遊不夜城。鶯花

催淑景。

敬梓

簫管奏昇平。巷是烏衣舊。

培源

歌翻白練輕

渡寒桃葉去。

敬梓

門掩柳枝橫。斷礎纏芳艸。

培源

叢祠長

杉亭集

全椒 吳煊 荀叔

詩

古意

癸丑

春山采靡蕪芳洲舉杜若美人十五餘
朱顏華灼灼襟佩鳴玉珩釵梁飾金蠹
紅樓女鏡發絲髭桂珠箔歌聲停
青雲舞衫迴皓鶴幽姿良自愛素心
何所託春風吹大隄楊花飛且落

田家

楓林夾茅屋新續不成村時有犬聲吠更無人語

前 言

DCC43/27

中国古老的封建制度经历了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延续到十八世纪中叶，早已败象丛生。这时，出现了两部对封建主义痛心疾首的长篇小说：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和曹雪芹的《红楼梦》。南吴北曹，相映生辉，共同为中国小说史写下最精采的篇章。

《红楼梦》问世后，研究者蜂起，光绪初就有“红学”出现^①。《儒林外史》的成就和影响相对要小一些，但研究者也还是代不乏人，也为我们留下一笔不可低估的遗产。总结过去的研究成果和经验教训，对于今天的《儒林外史》研究将是很有裨益的。

(一)

“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孟子》）感谢吴敬梓的亲朋戚友为这位伟大小说家留下十分丰富的传记材料，免得象《红楼梦》研究那样，为缺少小说作者生平的翔实记载而大费周折。综合分析吴槃（吴敬梓从堂兄）、金槃（吴敬梓从表兄、连襟）、金两铭（金槃胞弟）、金兆燕（金槃子）、程晋芳（吴敬梓好友）等人的真切记述和小说家本人的诗文，可以勾勒出吴敬梓创作道路和创作思想的清晰轮廓。

吴敬梓的道路是封建叛逆者的道路。二十三岁那年，嗣

父吴霖起逝世，吴敬梓的生活面临一个转折，从此明显地跨上叛逆的程途。方正不阿的吴霖起为恶浊的封建官场所不容，在苏北度过八年苜蓿生涯，终不免罢官，带着二十二岁的吴敬梓回到故乡，抑郁而死。这使青年吴敬梓初步体会到，在那种社会里，“守规矩与绳墨，实方圆而枘凿”^②，正直知识分子是难有出路的。父逝后他独担门户，种种矛盾丛集一身。首先是遭逢“家难”——族人欺他是嗣子身份，又是两代单传，蓄意侵夺祖遗，他从近亲身上发现了地主阶级贪婪残暴的本性；再从生活帷幕掀开的这一角观察社会人生，他看出了宗法家庭的黑暗、封建道德的沦丧、人情世态的炎凉。年青人单纯而和谐的精神状态被打破，不满和愤慨采取极端的形态表现出来：你们视财如命，我就挥金如土，你们虚伪狡诈，我就任达放诞。表面看来，吴敬梓这时一派纨绔习气；而骨子里却另有棱角。吴槩祝贺他三十生辰的诗说得很清楚，吴敬梓原先是“少年志卓犖，涉猎群经诸史函”的，那么是何时发生转变的？——“浮云转眼桑成海，广文（按：指吴霖起）身后何啗含。他人入室考钟鼓，怪鸱恶声封狼贪！”嗣父死后，吴敬梓直面怪鸱和封狼，由愤世嫉俗，激而为纵情背礼，放浪不羁：“一朝愤激谋作达，左骭史媪（按：乐人）恣荒耽”^③。金两铭的和诗也说“迩来愤激恣豪侈，千金一掷买醉酣”^④。这种“愤激”，就是对丑恶现实的强烈愤恨而激射出来的叛逆精神。此后几年，叛逆情绪随着接踵而来的不平事日益增长，祖遗财产则随着叛逆情绪的增长加速散尽。封建势力与他的冲突也越来越尖锐，吴槩说他“去年卖田今卖宅，长老（按：指封建家长）苦口讥誦誦”。他则以为“男儿快意贫亦好，何人郑、白兼彭、聃”^⑤。一个挺身向封建势力挑战的叛逆者形象跃然纸上。这个不愿继承官僚地主

家声祖业的不肖子弟，同他出身的阶级是格格不入的，“乡里传为子弟戒”^⑥，他被封建势力视作瘟疫的传染病源加以防范、排斥。但他决不屈服，三十三岁那年怀着“逝将去汝”的决绝情怀，愤然离开故土，宣告了同封建家族的决裂。在《儒林外史》的严贡生谋夺弟产、五河县势利熏心等篇章里，还可以看到他对县里地主阶级头面人物的切齿痛恨。

移家南京，仿佛汨汨襄河汇入浩浩大江，生活向他敞开了广阔的天地。他的叛逆思想也随之恣肆汪洋，向纵深发展。首先，他的经济境况、社会地位不断下降，“田庐尽卖”，只得拿衣服典当，或寻找机会“卖文”度日，甚至忍痛拿了心爱的藏书去换米。到了典无可典、卖无可卖的时候，就只有断炊挨饿。曾遇秋霖三、四日，姻亲程丽山叫人持米三斗、钱二千去看望，他已经断炊两天了！死前七天，他在扬州遇到趋于破产的程晋芳，执手泣曰：“子亦到我地位，此境不易处也，奈何！”^⑦情真语切，吐露了落拓者的悲苦辛酸。在由富贵跌落到贫困的逆境里，他备尝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对社会的不平、政教的黑暗，有了更深切的感受；也更多地体会到贫穷的苦痛，因而更能同情人民的疾苦，有时甚至还“僱佣保杂作，人不知故向者贵公子也”^⑧，在生活和思想感情上接近了下层人民。所以《儒林外史》每以爱抚的笔触描写卑贱的小人物，温煦之气直拂人面。

在叛逆的程途中，吴敬梓一直在追求理想，寻找理论武器。在南京、扬州一带，他广泛交接四方文士，与时代先进思潮的联系远比曹雪芹为密切。他的“至契”程廷祚，就是颜（元）李（塏）学派在南方的重要代表。一七二〇年李塏南游金陵，程廷祚屡过从问学，“当代名儒即有疑其以共诋程朱相诘

和者”^⑨。他的朋友、吴焯的老师刘著，也是颜李信徒^⑩。颜李学派把程朱理学和八股科举联系在一起进行批判，这无异给吴敬梓提供了理论武器，启迪他去揭露互为表里的八股和理学。颜李学派提倡礼乐兵农，主张培养博学而有实践能力的“通儒”，这对吴敬梓的正面理想也很有影响。戴望说，“（程廷祚）之学，以习斋（颜元）为主，而参以梨洲（黄宗羲）、亭林（顾炎武）”^⑪，吴敬梓同样也受到清初进步思潮中顾炎武、黄宗羲等思想家的影响。他不仅具有小说家的天赋，而且具有思想家的气质，在理性认识的指导下，他有着明确的创作意图。《儒林外史》各个部分之间，不是靠完整的情节或一以贯之的人物形象组合，而是由一个统一的主题思想来统驭、来贯穿的。他象个社会解剖学家，精确地剖析种种社会病态，分别提供病例，他笔下的艺术形象，一般都是他的创作意图的准确体现。

吴敬梓的世界观是复杂的，同时又是不断发展的。程晋芳说他晚年把治经当作“人生立命处”，其实他之治经并不自晚年始，在以经学包举社会科学的时候，他有意识地用治经对抗“于经生制举业外未尝寓目”的八股颓风，用经学批判“独好窃虚谈性命之言”的宋明理学。他治经，刻意要突破前人的窠臼，“不在宋儒下盘旋，亦非汉晋诸贤所能笼络”^⑫，务要说出“前人不曾说过”^⑬的话，表现了探求真理的顽强努力。就象顾炎武和戴震一样，他也确实通过解经（如著《诗说》等）表现了一些民主主义的思想因素；但又象在他前后的一些进步思想家一样，还难以摆脱传统儒家思想的羁绊。正统儒家的礼乐仁政、文行出处等观念，甚至还被作为《儒林外史》的正面理想。这诚然是历史的限制，但我们也仍须尊重作家在企图打破不

合理的现状时所表现出来的探索精神。

在个人经济地位下降、接触人生和社会问题的过程中，他的叛逆精神又进一步发展，解剖的利刃由家族移向社会，思考的范围由个人命运扩至民族前途，逐渐对朝廷功令、社会秩序、统治思想日益抵触不满乃至抗拒反对。这在出处的态度上集中地表现了出来。封建时代正直知识分子一向讲究操守，“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④——用《儒林外史》里的话说就是：“儒者爱身，遇高官而不受”。这关系到一个人重要的政治节操。能做官而不做，就意味着不与无道的当权者同流合污，是对黑暗政治的不满和抵制。因此，出处的选择体现了对现实政治的根本态度。吴敬梓一七三六年没有应荐到北京参加博学鸿词科的廷试，这纵使有身体不适的客观原因，但联系他前后的行动和诗作来看，他是有辞征辟的主观思想基础的。还在移家南京之初，在《买陂塘》、《题朱草衣白门偕隐图》、《寄李啸村》等诗词里，他就表示要象阮籍、嵇康那样借酒抗俗，隐于林下。一七三七年他写了《酬青然兄》、《贫女行》二首，对进京应鸿博试的吴槩寓有微讽。又写《伤李秀才》诗，对同次赴考而死于京都的李岑森表示哀伤。在《美女篇》里他庆幸自己没有象被荐入宫的富家女那样见嫉受困，而能够象汉皋神女那样保持着自由之躯。在《左伯桃墓》里他批评“急荣遇”而离开朋友的墓主，自豪地说：“亦有却聘人，灌园葆贞素”。从此他索性连诸生籍也放弃掉，再也不参加乡试、科岁考等一切科举考试。顾云《盩山志》的吴敬梓小传记述，当时有人批评他的辞征辟，他回答说：“吾既生值明盛，即出，其有补斯世耶否耶？与徒持词赋博一官，虽若枚马，曷足贵耶？”话说得很委婉，其实“生值明盛”云云，只是为避免惹祸而用的饰词，“天下有道

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⑤，若果“明盛”“有道”，岂能甘居贫贱隐而不见？这里所说的出去无补于世，也就是《儒林外史》里杜少卿说的：“走出去做不出什么事业”；也就象庄绍光说的，在当时“我道不行”，因此拒绝与臧仓小人为伍，不愿作御用文人为统治者点缀升平。金兆燕于此不愧是吴敬梓的知音，他概括这位前辈的风操说：“丈夫抱经术，进退触藩羝，于世既不用，穷饿乃其宜。何堪伍群小，颠倒肆诋议！”^⑥他还说，当一七五一年乾隆南巡，举行征召，许多人迎銮献诗的时候，吴敬梓却象卓诡不伦的东汉狂士向栩一样，企脚高卧，不予理睬^⑦。中年以后的吴敬梓不仅以恣情任性的个人生活态度与封建世俗相抵牾，而且已经发展到政治态度上与统治者离心离德；他不仅是自己家族的叛逆者，而且已是封建社会的叛逆者。正是从这样的基本态度出发，他冷峻地揭露醉心功名富贵的无知无耻之辈，热情地褒美讲究文行出处的贤人君子 and 嶙峋磊落的奇人豪士，表现了对现实社会的严峻批判和对理想境界的辛劳追求。

在愤世嫉俗中滋长着叛逆情绪，在穷困潦倒中接近了下层人民，在广泛交游中接受了进步思潮，又在进步思潮影响下发展着叛逆精神：种种因素交错渗透，相互推进，形成吴敬梓的道路。这条道路反映了十八世纪中国一部分优秀知识分子不断追求真理、不断前进的艰难历程。

(二)

《儒林外史》评论，最早是以序跋题识和评点的方式出现的。

迄今所见最早版本嘉庆八年(1803)卧闲草堂本即有闲斋

老人序(简称闲序),其后有:同治八年(1869)苏州群玉斋本金和跋,同治十三年(1874)齐省堂本惺园退士序和例言,光绪十一年(1885)上海宝文阁刊《儒林外史评》黄安谨序和天目山樵(张文虎)识语,光绪年间上海石史(徐允临)从好斋辑校本中徐允临题跋、华约渔题记、王承基信件,光绪十四年(1888)上海鸿宝斋增补齐省堂本东武惜红生序等。

《儒林外史》的评点,卧闲草堂本有回末总评(简称卧评),齐省堂本有眉批和回末总评(简称齐评),光绪七年(1881)上海申报馆第二次排印本有天目山樵的夹批(简称天一评),光绪十一年(1885)有上海宝文阁刊行的天目山樵评语“定本”《儒林外史评》(简称天二评)。天一评、天二评中夹有几条黄小田评语,此外苏州潘氏清抄本有潘祖荫眉批,从好斋辑校本有华约渔眉批、石史眉批,平步青《霞外摭屑》卷九有针对天目山樵评点而写的几十条评语。

这些序跋、评点中,闲序和卧评影响最大,二者的观点也互相契合,有不少精辟的见解为历来《儒林外史》研究者所重视和引用。我们只着重考察一下它们对《儒林外史》的主题和基本创作方法的评述。

《儒林外史》的主题是什么?小说一开头的《一箩金》(即蝶恋花)词就提出“功名富贵”四个字。卧评说:“‘功名富贵’四字是全书第一着眼处,故开口即叫破”(第一回);“‘功名富贵’四字是此书之大主脑,作者不惜千变万化以写之。”(第二回)闲序讲得更集中,并按对功名富贵的态度将书中人概括为四种:

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

人看破耻笑者；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

闲序的观点贯穿在卧评中：第二十一回总评说：牛浦郎“真乃自己没有功名富贵而慕人之功名富贵者”，这就是闲序说的第一种人。第二回总评说：“起首不写王侯将相，却先写一夏总甲。夫总甲是何功名？是何富贵？而彼意气扬扬，欣然自得，颇有‘官到尚书吏到都’的景象。”“梅三相顾影自怜，得意极矣，不知天地间又有王太爷在。甚矣，功名富贵宁有等级耶！”这些是闲序说的第二种人。第五回总评说：“此篇是从‘功名富贵’四个字中偶然拈出一个‘富’字，以描写鄙夫小人之情状。……荤饭秀才之巧黠，一一画出，毛发皆动。”“荤饭秀才”王德、王仁属于闲序说的第三种人。第一回总评说：“功名富贵人所必争，王元章（王冕）不独不要功名富贵，并且躲避功名富贵。”这就是闲序说的第四种人。作者正是把这位“难与世间人同其嗜好”的王冕，悬为月旦人物的标范，用以烛照全书，点明主题。

闲序、卧评的这一观点大抵为其后的评点家所接受：齐评在《一箩金》词“功名富贵”四字上眉批：“全书主脑”。天目山樵《儒林外史评》一开头就拎出闲序“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的话加以发挥。东武惜红生序也说：“其命意，以富贵功名立为一编之局”。

卧评、齐评也曾从八股科举的弊端阐发部分人物和情节的意义，但从没有把批判八股科举视作小说的主题，相反，卧评说：“斗方名士、七律诗翁，尤为题中之正面”（第十七回），并未以时文士为“题中之正面”。天目山樵也认为“是书特为名士下针砭”。小说第一回王冕批评八股取士之法说：“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

处都看得轻了。”天目山樵评说：“古来荣禄开而文行薄，岂特八股为然。”不同意把八股科举当作病根。

最早明确提出反科举主题说的是胡适。一九二〇年他写《吴敬梓传》，特别引述了王冕批评八股取士的上述这段话，说：“这是全书的宗旨。”此后众口相沿，反科举主题似成定论。

其实，“功名富贵”主题说，尽管不够科学，但比起“反科举”主题说来，要更接近实际，更能统摄《儒林外史》的思想内容。只是需要我们加以科学的阐释。

“功名”的概念本指功绩声名、建功立名，到科举时代，常用以指科第及由科第取得官职。“富贵”的含意本广泛，但当与“功名”的后一种意义连用时，也就与科举做官结下不解之缘。所以，“功名富贵”作为集合概念，在科举时代，它的核心是做官，有官就有权势和钱财，就又贵又富。如果说金钱资本是资产阶级围绕着旋转的轴心，那么，可以说，功名富贵是封建知识分子围绕着旋转的轴心，对待功名富贵的态度是对明清文人的一个试金石，把他们放在这个聚光点上，足以烛幽索隐，显其灵魂，使之纤毫毕露，声态并作地现身纸上。

明清的八股科举是求官的“正途”，对待功名富贵的态度当然包括了对待八股科举的态度，但比后者的包涵要深，外延也广。以功名富贵为主题，既可以统帅对科场士人面目的描写，也可以统摄对斗方名士嘴脸的揭露，而不必牵强地把名士说成八股的“副产品”，因为他们虽不以八股为敲门砖，但仍要附庸富贵，谋求“异路功名”；这一主题既可以包容对士子灵魂的勾画，也可以概括对社会陋俗的揶揄。盖冤说的“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也不外乎是对功名富贵的态度，象上引卧评所评鹭的夏总甲、牛浦郎，与八股科举没有什么关系，却可以